

# 论

山药蛋派  
作家作品

剖析山西作家创作风格

作为一种重要的  
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  
“山药蛋派”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

下

曲润海◎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山药蛋派  
作家作品

# 论

剖析山西作家创作风格

下

曲润海◎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 作家要乐于听故事

1980年12月，忻县地区文学创作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作者们聚集在一个房间里，以聊天的方式互相交流创作经验和各人的创作打算，谈着谈着就扯到了各人听到的奇闻轶事。一位省里来的诗歌作者说，他听到一个故事后，很想写篇小说，但他没有经验，不知道行不行。接着他就把听到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爱上了供销社的一位女售货员，但他不敢公开去表白，就借着买暖瓶塞子的机会，看人家一眼。这样越看越想看，隔几天就去买一个暖瓶塞子看人家一眼。这事被供销社支部书记发现了，以为他是个流氓，就去找他的单位的领导。经了解，他是个好人。支部书记心里明白了，于是就主动牵线，把一桩婚事办成了。当他们举行婚礼的时候，他从床下掏出了几十个爱情的信物——暖瓶塞子。诗作者问在场的成一同志，能不能写成小说？成一稍作思考后说，能。但是人物需要有一些规定，故事情节还得虚构一些。于是大家七嘴八舌一起出主意。有的说，青年知识分子最好写成“臭老九”，自己就觉得比别人低一截，无资格爱别人。有的说，最好不要一开始就写成爱情，就写他看着女售货员好，看上一眼就心里舒畅，不也很合乎生活的真实吗？成一觉得这些意见很有道理。最后诗作者说：“成一，你来吧！”不



到一个月，成一就把小说稿寄给了《汾水》，发表在1981年《汾水》第三期上，题目是《诱人的枣花香气》。

这篇小说的诞生给我们这样一个启发：作家是编故事的。作家也要乐于听故事。只有对听故事感兴趣，并且善于听，他才可能编好故事。

中国文学史上善于听故事的事例多得很。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讲到《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时说：“宋江等啸聚梁山泊时，其势实甚盛……于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又说：“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为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误，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帙，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倘使施耐庵对民间传说的故事和见于文字但还失之简略的故事不感兴趣，不屑一顾，恐怕是很难写出大部的《水浒传》的。清代的短篇小说大家蒲松龄的不少作品，更是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加工的。曾经有过传闻说，蒲松龄为了搜集奇闻异说，特意在门口摆设烟茶，邀请田夫野老来谈神说鬼，这样所搜集的故事便是他创作小说时的“粉本”。虽然鲁迅先生认为这种传闻不十分可靠，“不过委巷之谈而已”，但也不会是荒诞的臆造。蒲松龄自己就说过，他“雅爱搜神”，“喜人谈鬼”，以致“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终于成就了《聊斋志异》这部在文学史上占着重要地位的短篇小说集。由此可见，就是像施耐庵、蒲松龄这样的文学大家，也不可能离开社会生活，离开“道听途说”。

乐于听故事，也就是乐于欣赏群众的创作。这些创作虽然一般是粗糙的，不完整的，但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同样是动人

的。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说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的对象时，就有“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群众乃至文艺界的同行口头传闻的故事，就是这种原始材料。我以为，作家在群众中听故事，就是这样的一种重要的联系，是作家深入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与方法。如果一个作家愿意深入生活，却又对听群众的故事不感兴趣，恐怕是很难做出成就的。文学家不同于政治家。政治家决定政策，处理政务，不能靠道听途说，必须真帮实地调查研究。文学家则不然，他对道听途说的各种东西，决不可鄙弃，而应有极大的兴趣。

当然，有出息的作家，不能光靠听别人的故事，不能搞转手买卖，而要有自己的创造。成一听暖瓶塞子的故事时，人物只有一个（男的），而当他的作品问世时，人物却是一对了。这样，不仅小说的前半部写他借买暖瓶塞子偷看她，以致时至盛夏，仍然能闻见诱人的枣花香气，写得是多么饶有趣味；而且小说的后半部写她来登门看他，每次都说着极简单的“吃过饭了吗？”“忙吗？”，更显出了这是一种打着十年浩劫的烙印的苦涩中饱蕴着甜味的爱情，写得颇有深度。作家通过自己的创造，把生活，把人物的心灵写活了，写美了。

作家所以能在听了别人的故事后，演化、创造出自己的人物、故事来，他平时对生活素材的积累是其成功的坚实基础。倘使成一平时缺乏这方面的观察体验，光听了一个故事是不能成篇的。在这里，暖瓶塞子的故事不过是一个激发作家创作灵感的契机。它启示我们，作家要能写出好作品来。深入体验生活，辛勤地积累生活素材，还是第一位的。成一所以能不断地写出新作品来，坚守他的生活根据地，经常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可



以说是他的创作秘诀。当前，我国无论农村还是工矿，在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贯彻后，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熟悉和描写这种变化和变化后的生活，是摆在我们的作家艺术家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毫不犹豫地投身到这种新的生活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当前创作中一些作品信手编造的虚假浅陋的现象。

(1981年4月8日，载于《西文学》1982年第1期)

## 生活·读书·追求·实践

——焦祖尧、成一成功的“秘诀”

近几年来，一些搞文学的中青年同志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年作家焦祖尧同志，为什么在写工业题材的作者中 20 多年一直前进而没有销声匿迹？青年作家成一同志，为什么在成名之作发表后能不断地写出新的作品来？他们为什么能在创作中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呢？

本月 11 日至 13 日，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召集我省部分文艺评论工作者，对焦祖尧、成一的创作道路和艺术特色进行了讨论。会上，焦祖尧说：生活和读书是他创作前进两个车轮，准确而形象地道出了他和成一同志创作的奥妙。

读焦祖尧和成一的作品，总感到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他们笔下的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形象，在我们面前活跃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先是生活积累在起作用。焦祖尧本是大同市一个工厂的技术员，还在雁北农村工作过，以后又在煤矿上扎根。成一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原平县工作，跑遍了原平县的广大农村。他们两人不仅热爱生活，而且对生活观察得细，思考得深。因此，他们的作品都描写细致。耐人寻味。生活这只轮子确实在载着他们不断前进。



文学家不仅要积累生活素材，也要掌握写作技巧，这主要是通过读书来获得，并且经过实践来巩固和提高。焦祖尧、成一在我省中青年作者中是读书较多的。他们不仅读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作品，而且读外国的作品。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有浓厚的兴趣。除了文学书之外，他们也读一些其他社会科学的书。不少青年作者说，成一读马列的著作比他们多，这便使得他观察农村问题比较深，作品的思想容量比较大，给人的印象比较新。就文学作者来说，不读书的是没有的，但读书过于偏狭却是有的。这显然对作者提高分析、认识社会现象的能力和掌握艺术技巧是不利的。

但是，有了生活，肯于读书，是不是就一定能写出好的作品呢？也不一定。还需要不倦地进行艺术实践，尤其要大胆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焦祖尧和成一都是有自己的艺术风格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细、深、新、巧的特点。他们都不十分注重铺排错综复杂的情节，却善于描写细节，而且每抓住一个细节，就充分运用，务使它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但他们艺术风格又各具特色，看焦祖尧的作品，好比在公园里看花，每盆都是经过精心加工的，千姿百态，赏心悦目；成一的作品仿佛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同样千姿百态，令人留连。在语言上，焦祖尧擅长议论，他常常通过人物，或作家亲自出面，对人生、对事物发表意见，往往十分精到，有一种诗人和哲学家的风度，挖掘出了深深埋藏在故事中的思想，恰当地点明了主题思想。成一在作品中则很少自己说话，他的思想都是通过人物的行为与心灵表露出来的，他的语言中既有鲁迅的深沉，又有柳青的隽永，还有原平群众口语的朴实与情趣。一个作家写好故事不容易，写好人

物更不容易，写出作家自己的风格尤其不容易，是需要作家长期反复的实践才能见效的。

生活，读书，追求，实践，是焦祖尧、成一成功的“秘诀”，我们的中青年作者们，也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吧！

(1982年8月14日，载于1982年8月19日《太原日报》)



## 漫谈成一小说的语言

成一是我省有代表性的一位青年作家。他的小说内容丰富，思想深刻。但却不外露，而是在平淡中见真谛，含蓄，耐人寻味。他所以能如此，除了构思比较独特外，语言运用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成一小说的语言，整个来说是经过选择和提炼的。他对他所掌握的语言材料是珍惜而又吝啬的。他不故意为了表现语言的丰富。把所有的好话都泼出来，在一篇里堆砌得很多，臃肿不堪，而是慎重选取，一旦用在作品里，就让它充分发挥作用。不论是用在描写人物肖像，渲染环境气氛，揭示人物心理上，都往往抓住一点，多次反复。以加深印象。仿佛诗歌的一唱三叹。在《顶凌下种》中，多次写高明海深邃的眼睛；在《柳主任》中多次写柳主任警觉到什么；在《五月鲜》中多次写粮站站长懒散的倦容，见了鲜桃为之一振；在《四嫂》中反复写四嫂的面色；在《连襟》中则反复对照着写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在各自的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滴滴清明雨》中几次写农政部长和剧团团长“研究”戏，每次桌子上都放着几张戏票；所有这些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就是写人物的对话，也往往采用这种手法，比如《四嫂》中写卫红姑娘催促四嫂去演唱：“哎呀呀。见天得一趟一趟请哩！你又不

是不能唱。唱黄色小调那么上瘾。搞意识形态革命就这么消极，见天得一趟一趟请哩！”这既符合她的性格和身份，又是农村妇女习惯的说话方式。

成一不是山西人，但由于他在原平工作多年，已经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语言特点，特别是他肯下功夫吸收民间口头语言的营养，加以提炼，使得他的人物语言涂上了一层地方色彩。比如原平话中的“了”字，大部分发音是“咧”，将“坏”叫“灰”、发“灰”，叫“坏人”是“灰人”，我们便可以在小说中见到一些这样的字眼。其他如“天麻阴阴地有了”、“寡飏飏的风”、“红辣辣的日头”、“蒙生生细雨”、“粉浆水水”、“种地的凉壶”、“败兴货”、“丧良心货”、“恼眉悻眼”、“肿眉泡眼”、“苗儿出来，匀点点，利棵棵”等等，都是当地人的惯用语，作者把这些用在作品中，增加了真实性和亲切感。但成一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不局限于一地，不是语言越土越好。而是追求文学性和规范化，因此他的作品虽然引用了一些地方话，却并不怎么生涩，别处的读者同样可以读得懂，同样可以领略他的语言风味。

成一在语言上也是努力向语言大师们学习，向名著学习的。在这方面，他也在不断地摸索和尝试。他的《四嫂》显然学鲁迅的成份很大，而其余名篇则兼学赵树理、柳青等老作家，这种杂取各家所长，融汇于自己创作的探索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从而，不仅增加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而且也使自己的创作有了较为明显的长进。但有时由于化得不够，以致在作品中留下一些痕迹。《四嫂》的语言有的地方就显得别扭，有的地方为了简洁，选用季一些文言语汇，有的地方由于跳跃姓大，



用了一些连接词和句子，显得生硬，不自然。就是语言运用上较好的《连襟》，也有人物对话和作者叙述的语言风格不大协调的地方。

以上提到的这些不足的地方，对于成一这样勤于钻研和实践的作者来说，是不难改进的。

(载于1980年10月23日《山西日报》)

## 读张石山的短篇小说《对门亲事》

收到 1979 年第三期《工人文艺》，一开卷，立即引起了兴趣。仅就《对门亲事》谈点感受。

《对门亲事》是学《小二黑结婚》的手法写的，先从两位老人的外号介绍起，接着介绍两位青年和那位金旺式的人物、外号“老公鸡”、“野叫驴”的厂政治部主任刘沛。介绍完人物，基本的故事情节、矛盾冲突也就清楚了。接下去就写矛盾的发展和结局，自然顺畅，如人所愿。

这篇小说从故事的结构和写法来说，并不稀奇，但都还是愿意看，什么道理呢？一是作品有生活，有新意；二是人物个性鲜明；三是描写细致。“出身不好”和“条件不高”这两位老人的外号的产生，有点喜剧性，然而仔细回味，却是悲剧的产物。“四人帮”大搞反动的血统论，给多少老年人心灵上刻下了伤痕，又使多少青年人受到株连？

“出身不好”是“门槛大王”谢来顺自悲心理的典型写照，而“条件不高”则是周秀英中血统论毒很深的相反的写照。周秀英用“条件不高”否定了女儿的所有提亲对象，舅舅是“右派分子”的不行，祖父是房产主的不行，就连姐姐的小姑子的公公有“海外关系”的也不行，血统论给她带来了莫大的苦恼。作者写

他们这种伤痕，十分细致。比如写周秀英来谢来顺家同他见面，一个理直气壮，一个低声下气。“谢来顺正像晋剧花脸名角狮子黑，一样越吼越有劲，周秀英来了。老谢一惊，忙换了笑脸，紧着让座倒茶，自己立在一旁，毕恭毕敬”。“周秀英也不谦让，直杆杆地坐下来，左褪跷到右腿上，两只巴掌叉叉起来反扣膝盖头上……”谢来顺到了周秀英家，各自的基本态度虽然没有变。但由于东道主和来宾的身份换了，因此又是一番描写：“周秀英稍稍欠了欠身子，冷冷一笑，指指凳子：坐下说吧！”“谢来顺斜着身子坐了半个凳子，两只膝盖紧紧并着，双手扶在膝盖头上，半哈了腰道……”这些地方同《小二黑结婚》中描写二诸葛、三仙姑大不相同。他们是七十年代中受“四人帮”毒害的人的形象，因此尽管小说前边介绍他们时有点像《小二黑结婚》介绍两位神仙，但到这里，则完全是自己的新内容。作品就是通过这些具体可见的细节和这些人物的行动来揭露“四人帮”鼓吹的血统论。

两个青年人薛青海和谢春山，也有他们自己的特点。谢春山，一头扎在技术革新上，近乎傻，但他是“出身不好”的，又不愿混日子，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他有爱情，但不敢表露，甚至想都不敢。而这些，却正合乎薛青海的要求，因为她“见不得男子汉们低三下四的贱样子”。薛青海出身好，又是从小由母亲娇惯下的，因此她的性格热情，外露，与谢春山适成对照。谢在家是父亲经常吼骂的对象，近于窝囊，薛在家则骄野任性，一切由着自己。她敢违背母亲的意志，敢和母亲辩论。《周秀英兴师》一节中母女二人的对话，既表现了薛青海的娇，又表现了母亲的惯，那语言和神情，实在维妙维肖得很。这篇小说从许多细节的描写上，可以看出作者观察生活的细心，描写的细致。

文学是写人的，一个作品能把人物写得有血有肉，神气活现，栩栩如生，就成功了一多半。这篇小说在刻划四个人物上，是较成功的，因此就给人新鲜之感。

这是写工人日常生活的作品，它不像过去的一些作品那样，突不开大轰大嗡的“阶级斗争”场面和生产、技术革新过程。写大轰大嗡的“阶级斗争”多是口号和概念的堆砌，早已为人们所厌烦了。即是写生产、技术革新，也不仅外行不愿看，就是工人自己也未必喜欢。因为作为生产技术革新来说，你写得再好也总比不上一个技术报告和介绍。工人是革命的阶级，但并不是一切时间都“革命”和生产，也还是需要一点人情，需要一点精神生活。我想，这篇小说如果拿到工厂去征求意见，工人是会欢迎的。

(发表于《工人文艺》1980年第1期)

## 让群众去试验、创造

——读韩石山的短篇小说《搭伙儿》

韩石山同志的短篇小说《搭伙儿》（《汾水》1980年2月号），提出了农村的一个重要的新问题：农业生产管理责任到人后，农民不习惯怎么办？小说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写了一个生产队的几名妇女，在各自锄地的劳动中，感到孤单，无聊，于是在休息的时候，凑在了一起议论，互相搭起伙儿来，给你锄了给我锄，加快了速度，保证了质量，而且心情愉快。在她们的影响下，别的妇女和男人也搭起伙儿来。这个故事反映了农民群众在二十多年的合作化道路上已经走得习惯了，今天搞生产责任制，应该考虑到这个客观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农村经济政策，是符合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像前几年那样，某些地方搞大队核算，取消自留地等等，是不利于农业生产，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反之，在实行责任制过程中，也搞一刀切，不允许一部分农民根据自己的情况在新形势下组合起来，也不利于发展生产，不利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促进生产，不符合农民的愿望的。小说中提出搭伙儿的办法，不妨由农民自己去试验。

韩石山是一位熟悉农村生活的青年作家。他观察生活敏锐，

反映生活及时，善于从个别事例中发掘重要的道理。生产责任到人是一个新鲜事物，要贯彻执行，必须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必须让群众试验，创造各种适合各地条件的形式。韩石山遵循文学以个别反映一般的规律，及时地抓住这个个别，加以描绘，开掘，让人们去思考，认识，这对我们的农村工作也是不无益处的。作家应该是时代的旗手和向导，作品应该是生活的镜子，感应的神经。对工作、生活、思想、情感应该起认识、指导、陶冶的作用，因此自然主义的描写，悲观主义的渲染，都是不足取的。韩石山是懂得这些的，因此他的作品有着强烈的明朗的时代感。

这篇小说在塑造人物上也是下了功夫的，几个人物都有个性。主人公锁秀的精明、能干、利索、热情；山东婆娘阮书华的老成、稳重、大方、豁达；记香的好强、有心计，又有点心胸不开阔；秀英婆婆的委屈求全，善于言词等等，都写得维妙维肖，读之如见其人。小说中农村生活气息，到处可见，如叙述六个有儿有女的妇女在一起耍笑的气氛，是十分恰当的。又如写她们竞赛时，说“她们像秋天的雁阵似的，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往这边斜，一会儿往那边斜。”颇为形象地描绘了你追我赶，互不相让的竞赛锄地的画面。小说的人物语言，个性特征鲜明，如锁秀与秀英婆婆说到秀英参加搭伙儿时说：“光你行还不行，得秀英行了才行。”恰当地表现了锁秀说话风快的性格。

(1980年2月29日夜)

